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 在蒙古新朝的繼續

姚 從 吾

一、引 言

金元之際，（約當西曆紀元一二一五年，金朝南遷，蒙古佔領燕京（北平）以後，到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曰元以前。）北方塞外遊牧族蒙古騎兵衝入長城以內，中原無統，華北大亂。因是女真金朝在東亞已接續推行的中華傳統文化，又有岌岌中斷的趨勢。戰亂四起，民不聊生；原有制度、習慣、民間生活，凌亂失序，不能繼續維持。當時的亂象，看宋子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所說：「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元文類卷五十七）與道藏（洞真部）金蓮正宗記所記：「當蒙古銳兵之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金蓮正宗記卷四。）慘象種種，可見一斑。經歷長期混亂，華北中原地區，因為有了全真教邱處機等的維持斡旋，新興的道教曾繁盛一時，中原人民也由此獲得蒙古新統治者的若干優待。繼而佛教徒有名僧海雲及西藏國師的支持，也漸漸取得國教（就蒙古全部說）的地位。儒釋道三大宗教原是東亞中華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支柱。論基礎與歷史，自然以儒教為第一，佛教次之，道教一向被士大夫所輕視。但當蒙古四大汗時代（一二〇六——一二五九）的太祖太宗時期（一二〇六——一二四六），則全真教（新道教）比較最為活躍，佛教次之，儒教則甚為暗淡失色。到了西元一二三三年蒙古軍佔領開封，摧毀了殘餘的金朝，因有名詩人元好問的說項，當權派耶律楚材的多方努力，找到了衍聖公孔元措，正統的首席儒教，方漸漸獲得承前啓後的繼續存在。這一段十三世紀蒙古新朝與「孔教衍聖公職位」復興的歷史，雖無當年全真道教的活躍與佛教的借重西番勢力，漸漸成為蒙古人的國教；但也有一段曲折艱難的經過，而是值得加以追述的。近年來著者研究忽必烈汗尊重儒教與利用儒者達成中統至元的興盛，因亦從事分析儒教復興與孔子被

尊崇的經過。認為當年曲阜「孔教」的復興，孔元措的再度得為蒙古新朝的衍聖公，當歸功於下列的三個因素：一、由於中原儒教傳統勢力的雄厚，因而有元好問、耶律楚材與姚樞等，對於孔元措的推薦。二、由於蒙古可汗素重信仰自由，對宗教普遍尊敬，沒有成見，故太宗、憲宗、忽必烈，雖另有信仰，而對於正統儒教的恢復，視為當然，無形中給予了同情與維護。三、由於孔子第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孔元措，在當日學術界頗有地位、人事關係亦佳；他自己又是有識見與有能力的人，因以獲得蒙古可汗的信任與朝野人士的推戴。本論文遵循上述原因，利用近日研讀元史與元人文集所得有關此一小問題的多種材料，寫成簡單報告，以期對於孔元措在蒙古新朝仍得繼續為衍聖公的一段歷史，有所說明。尚祈知交好友，不吝珠玉，有以教之。

二、孔元措的身事考略

(1) 孔元措未入元以前的仕歷 孔元措是孔子的五十代孫，元史無傳。他的行事附見於金史卷一〇五他的祖父孔璠傳中。說他「字夢得：父總，金世宗大定元年（一一六一）襲封衍聖公。明昌元年（一一九〇）（總）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三年（一一九二）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於令。』四年（一一九三）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太學生陪位。承安二年（一一九七）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金）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這一段雖是語焉不詳，但「後歸大元終焉」，也指出他曾身經改朝換帝的大亂，而所遭遇的又是東北方面的遊牧民族。這一世變的渡過，衡情度勢，自是異常艱辛的。

幸而熟於金元之際掌故的清朝史學家施國祁（一七〇五——一八二四）先生在所著金史詳校（卷八下）中，「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的後面，加了兩大段的補充，對於孔元措的研究，甚感便利。一段是轉引錢大昕的養新錄（卷十三），說明孔元措曾於金哀宗正大四年（一二二七）利用先世，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作的孔氏家譜與四十七代孫孔傳作的祖庭雜記兩部書，在金哀宗正大四年（一二二七）合編成一部祖庭廣記，「仙源文獻，至是始備。」引起了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的注意，奏准皇帝，特命孔元措襲封衍聖公，令赴闕里奉祀。這部祖庭廣記也允許於壬寅

年（一二四二）在曲阜「增補校正，重印以廣其傳」。另一段是施氏利用自己的博覽，舉出金史及趙秉文滏水集（卷十二）中的下列三事，把孔元措的行事，加以補充。(1)金史（十四）宣宗紀：「貞祐二年（一二一五）乙亥，詔元措爲太常博士。或言：『宣聖（孔子）墳廟在曲阜，宜遣奉祀』。上念山東寇盜（已起），恐懼其害，故有是命。」(2)金史（十七）哀紀（哀宗）天興元年（一二二三）壬辰，「三月甲午，元人理索元措等二十一家及歸順人家屬。」是編後云：『聖旨於南京（開封）特取，正其官太常博士是也。』(3)又說：「趙秉文滏水集（卷十二）張左丞（行信，金史一〇七有傳）碑文：『次女嫁孔元措，』則行信爲丈人行。他在正大四年（一二二七）爲祖庭廣記作序時，已再致仕矣。」

(2) 孔元措金亡入元後再爲衍聖公的經過 今考孔元措於一二三三年金朝滅亡數月後，復得爲蒙古新朝的衍聖公。這一新任命，實得力於當時的名詩人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與蒙古漢地當權派耶律楚材（一一八九——一二四三）的推薦與竭力提携。孔元措受到元好問、耶律楚材等當時社會名流的尊重，當基於下列的兩個原因。第一、他是當年孔氏北宗的衍聖公。即是，經靖康大亂以後，仍留在北方，孔子的直系親屬，五十一代孫，金朝公認的衍聖公。第二、是他能著述寫作，編著祖庭廣記，通曉古代雅樂，是一位業有專精的學人。他的受到元好問、耶律楚材，與稍後姚樞（一二〇二——一二七九）們的尊崇，完全是出於天下的公誼，並非私人的阿好。(一)名詩人元好問的推薦孔元措於耶律楚材，事在癸巳（一二三三）蒙古兵佔領金朝南京（開封）的時候。我們知道金哀宗天興元年壬辰（一二三二），三月二十日以後，蒙古兵開始圍攻南京（開封），激戰十六晝夜，死傷以萬計。蒙古主帥知南京不可卽下，乃改採大包圍政策。十二月金哀宗以京師糧盡，乃決意出走歸德。第二年（天興二年）癸巳（一二三三）正月金叛將崔立以開封投降蒙古，四月蒙古兵正式入汴（開封）。四月二十二日元好問以當日社會賢達的身份，寫了一封長達八百多字的親筆信，送給蒙古的當權派、契丹人耶律楚材。原信名癸巳寄中書耶律公書，（見元遺山集卷三十九，與蘇天爵元文類卷三十七。）信內開列了當時金朝有地位，有學識的朝野學者五十四人，懇請他對於這五十四人，加以推薦與引用，以助成蒙古新朝的各種建設事業。在這張名單中，元好問推薦的第一位，即是「聖者之後，衍聖公孔元

措」。(二)說到耶律楚材與孔元措的關係，也是久有淵源的。(1)金史（十七）哀宗紀下說：「天興元年（一二三二）三月甲午，大元遣使自鄭州（今河南鄭縣）來諭降。使者立，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上起立受之，以付有司。國書中指名索取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等。……」大元這一要求，無疑是出自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議。天興元年，壬辰三月，早於癸巳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年又一個半月。由是可知耶律楚材的注意孔元措，尙是早於元好問的推薦的。(2)元史（卷二）太宗紀說：「五年癸巳（一二三三）正月庚申（十五日），金主奔歸德，戊辰（二十三日）金元帥崔立以南京（開封）降。夏四月速不台入南京，六月詔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十二月勅修孔子廟。」後邊的這兩件事自然是也與元好問的上書耶律楚材，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耶律楚材是早已認識了孔元措的，四月二十三日上書，六月即正式發表孔元措爲衍聖公，在時間上可以說只是發生了「催生」的作用。(3)元史（一四六）耶律楚材傳也說：「癸巳（一二三二）汴梁（開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力爭，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開封）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這一節與上一節是一件事的兩面互記，各有交代，自可憑信。合上述兩事觀之，孔元措經由元好問與耶律楚材的推薦，又得重在蒙古新朝（太宗時代）繼任爲衍聖公，經過情形，甚是明白清楚。

(3) 入元後重要行事略述 孔元措入元朝繼任衍聖公以後，曾努力爲蒙古新朝制禮作樂，曾請求徵集太常已散失的禮官，樂官與樂工，在曲阜爲朝廷訓練一種樂隊，演習登歌樂等，協助蒙哥大汗（元憲宗）三次祭天。同時也努力從事曲阜孔林重建的工作。據祖庭廣記（卷二）說：他在金章宗明昌元年（一一九〇）襲封時，年十一歲；大概是生於金世宗大定十九年（一一七九），死於元憲宗二年（一二五二）左右，得壽七十二歲以上。（這裏恐尙有待發之覆，暫決定如上文，餘俟詳考。）

三、孔元措入元後的制禮作樂

元史（卷六十八）禮樂志與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多次說到了孔元措復任衍聖公

以後，對於「制樂始末」與「祭天典禮」的貢獻。這些反而是全真教邱處機、李志常們所意想不到，而也是沒有作過的。兩志中對於孔元措幫助元初蒙古可汗制禮作樂的事，記述頗為詳細，也很有意義。今分別列舉，並加以說明，如下：

(1) 建議收集亡金太常司的禮官與樂工 元史(六十八)樂志「制樂始末」說：「太宗十年(一二三八)十一月宣聖(孔夫子)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孔)元措來朝。言於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錄！』於是降旨：『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孔)元措領之』。又說：『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這一節是說：「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汗的第十年(一二三八)，蒙古西征軍統帥拔都，雖是在歐洲仍然進行侵略戰爭；但在國內(蒙古與華北)、長城以內各地，則已逐漸安定。七年(一二三五)「在和林(庫倫附近)建造萬安宮，八年(一二三六)三月落成，諸王各治具來會。」七年(一二三五)「中書省請頒大明曆，從之。」八年(一二三六)正月又「下詔印造交鈔。(即發行紙幣。)」三月修復孔子廟及司天臺。」准許耶律楚材於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王萬慶、趙著副之。」九年(一二三七)「四月又於和林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這些都可以看出，軍事時期已告一段落，文治建設乃逐漸興盛。這時候衍聖公孔元措自曲阜來和林朝見。建議說：「戰亂之後，禮樂制度散失，今燕京、南京(開封)等處，亡金太常掌管宗廟祭祀的舊臣，及禮冊、樂器，尚多存留。懇請政府降旨收錄。」於是可汗降旨：「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孔元措領之。」即是交孔元措仍舊掌管。蒙古初年是沒有俸給制度的。這些人的口糧、用費，指定「由本路(東平路)課稅所支付。」我推想這一辦法，頗見巧思，或者也是透過耶律楚材、嚴實父子等人纔能見諸實行的。

(2) 他曾聘請專家在曲阜設立研究班訓練祭天樂隊 元史(六十八)禮樂志又說：「(太宗)十一年(一二三九)(孔)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又說：「十二年(一二四〇)夏四月，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又說：「十六年(一二四四)，這時候元太宗已死，實即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三年。)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張，一絃、

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各二。」他既已聘請了專掌作樂的專官許政，與專掌禮儀的王節，又集合了樂工翟剛等，共有九十二人。遂開始在曲阜宣聖廟，作登歌樂，依次演習。後來許政又推薦了大樂令苗蘭、指授工人造琴十張。更可見他們對於制禮作樂的慎重。凡是制禮作樂所需要的物品，政府皆允許及時添置，自無問題。

四、孔元措的助成元憲宗時代的郊天大禮

孔元措是金朝的衍聖公，兼太常卿，職責在管理朝廷祭天地等祭祀事宜。蒙古人對祭天極為重視，他因此建議朝廷，徵集舊日太常樂官、禮官、樂工等在曲阜宣聖廟實地從事肄習。一切設備用器等，均由朝廷頒發或出款製造。這自然是制禮作樂的籌備工作，供大汗（皇帝）祭天時使用的。這一點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中，郊祀（祭天）條，設有專章，曾記述元憲宗（蒙哥汗）多次祭天時，孔元措在曲阜所訓練的樂隊，協助祭天並有優異的表現。元史（七十二）祭祀志「郊祀上」說：

（1）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反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爲之也。

（2）憲宗即位之二年（一二五二）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解釋詳下）。

（3）其十二日（應即同年八月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孔）元措言：『合祭昊天上帝，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成吉思汗）、睿宗（拖雷汗）配享。』」（以上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頁三）。

（4）元史（六八）禮樂志也說：「元憲宗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於日月山、召（曲阜）禮樂人赴日月山應值。祭畢，命驛送樂工還東平。」（以上元史卷八，禮樂志，制樂始末。）

從上邊所說，元憲宗二年在日月山祭天典禮的隆重，可以想見。蒙古可汗用中原禮節，郊祀天地，可證他們對於中原傳統文化的重視。這裏爲補充元史（七二）祭祀志的不足，須略加考證，以見這一祭禮影響的遠大。一、據元史（一五八）姚樞傳說：「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一二五二年）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忽必烈）親至觀禮。又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

這一節是說：大祭祀時，不但是歌工、舞郎、俎豆等物品，令東平守臣從曲阜用車輦運而來，而且忽必烈親王曾親往觀禮，很感興趣。同時又命令東平守臣（時東平爲忽必烈分地轄區。）「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二、憲宗在位九年（一二五一——一二五九），據元史（七十二）郊祀志郊禮條說他在日月山祭天，共舉行了三次。如下：(1)憲宗即位之二年（一二五二）秋八月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2)歲甲寅（一二五四）會諸王顆顆腦兒之西，祭天於其地。」這一次元史四憲宗紀說的更爲明白，「四年甲寅（一二五四），是歲會諸王於顆顆腦兒之西，乃祭天於日月山。」(3)祭祀志（七十二）說：「丁巳（七年）（一二五七）秋駐蹕於軍腦兒，祭天於其地。」這一次元史四憲宗紀也有補充。說：「秋，註蹕於軍腦兒，釀馬乳，祭天。」既然都是在日月山祭天，所用禮樂人及祭器、儀仗等，應當是與第一次所用者彼此是相同的。

(四) 日月山今地略考 這裏的日月山，固定地點，一時不易確定。(1)據屠敬山先生的說法，「山在和林以北，蒙兀語曰：『納刺·赤刺溫山。』見所著蒙兀兒史記，卷六，蒙格可汗（憲宗）本紀（頁六）。(2)中國地名大辭典說：「日月山在今甘肅西寧縣治，西川口外，蒙古語曰『納刺·薩刺。』今猶爲漢蕃互市之所。」這兩種解說，尙難認爲滿意，其詳將再另考。我假定日月山是一個公名，地點不止一處，和「川勒地面」，與「蜀口」一樣。

五、孔元措時期曲阜闕里與孔林的殘破與重建

金元之際，華北受戰亂影響，長期破壞。山東曲阜孔子家廟因寇盜連續，自亦不能幸免。孔元措身爲金元兩朝的衍聖公，既見闕里殘破，自然躬親從事局部的重建。金史（十四）宣宗紀貞祐三年（一二一五）說：「詔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於朝，或言宣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宣宗）念：『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懼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這時候應當是曲阜闕里被寇盜破壞的開始，時在西元一二一五年，即金宣宗南遷開封的第二年。直到一二五二年憲宗祭天於日月山，中間三十七年衍聖公均爲五十一代的孔元措。曲阜闕里（在曲阜城中）與孔林（在曲阜城北）殘破與重建，金元二史中雖無專條記載；但在這時候，名詩人元好問等曾於乙巳年（一二四五，乃馬真皇后時期）左右親自遊歷曲

阜。元好問且作了曲阜紀行詩十首，以誌所見所聞。這十首詩載於現存元遺山集卷二。清季金元史專家施國祁首爲作註。我們知道元好問對於孔元措的再仕元朝，是有推薦的功勞的。元氏又是在中原混亂時期，努力維護孔教的社會賢達，對於大亂後曲阜縣闕里與孔林的殘破與重建，自是備極關懷。茲選十首中有關曲阜殘破與重建情形者如下，可以見當年（金元之際）大亂中山東曲阜孔林保全情形的一斑。

- (1) 「荒城臥魯甸，寒日澹平燕。千年素王宮，突兀此城隅。……今日復何日？南冠預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神明觀，欣幸當何如！」（以上選自第一首。）
- (2) 「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儀。」（以上第二首。）
「誰言甲戌（一二一四）亂，煨燼入炎燎。青烟干雲上，羣鶴空自矯。……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雩臺滿荒榛，達宮（魯之泉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晏與早。」（以上第三首。）
- (3)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顧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宗周方訖籙，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以上第五首。）
- (4) 「白塢（同塔）表佛屋，萬瓦青粼粼：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鄰。……孟氏非所期，安得揚與荀。丹青贊神化，舊染爲一新。坐令鐘魚地，再睹籩豆陳。吾謀未及用，勿謂秦無人。」（以上第八首。）
- (5) 「喻彼失相者，俛不知所如；指南一授轡，聖門有修途。陽光照薄暮，尙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灑掃今其初。」（以上第九首。）「昨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小子良斐然。」（以上第十首。）

就上引諸詩說，殘破與重建的跡象，甚爲明顯。詩中充滿失而復得的生趣。言爲心聲，元好問與耶律楚材這番衛道的努力，總算有了結果。他們的心情，自然也就是孔元措的心情。這種心情就是從現存祖庭廣記卷十二，後邊的跋語：「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一二四二）年五月望日。」也是可以看出來的。